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研究述评

张慧佳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场域的重要诗学形态,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以其对于文学之独立品格的坚守而自有一套颇有价值的诗学话语, 这也使得其在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 学界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学理意义上却普遍存在着“主体间性缺失”“对话性缺失”和“共生性缺失”三种问题。因此, 针对既有的三类缺失性问题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 研究述评; 主体间性缺失; 对话性缺失; 共生性缺失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3-0164-08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即在1912—1949年的现代中国这一时空中得力于西方自由主义诗学和中国传统个性主义诗学资源的共同浇筑而萌芽、发展的一种文艺理论形态。它是在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之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既强调主体之独立,却又摒除政治启蒙思想于艺术创作之干扰,以实现艺术之独立为终极诉求的文学理论形态。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场域的一种重要诗学形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一次又一次地引领了中国现代诗学潮流的同时,也因其独特的价值观念而一直身处于话语论争的漩涡之中,从五四文学革命起,该诗学形态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作“他者”而加以严厉的批评。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为代表的大批海外学者对以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关注才逐渐将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主义诗学推回了中国现代诗学场域的中心。

而其之所以能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正是因为其在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催生出了种种既与传统诗学相异又与之相接的诗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它既提倡借鉴自文艺复兴以来先后出现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自由主义诗学资源来建构中国文学新形态,从而突破古典诗学之条条框框对于文学发展的束缚,又潜在地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经验,在纵向上延续了中国传统诗学之脉络。

由此可见,跨越的诗学视阈和宽容的诗学胸怀使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家在认识价值之外,又从审美价值方面丰富了中国诗学的话语内涵和表现形态,从而真正推动了中国诗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这使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具备了不可代替的现代性意义。而正因其话语内涵和表现形态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才使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免不了成为各方诗学力量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综观以往学界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研究便可知,该研究主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霍布豪斯(L.T. Hobhouse)的《自由主义》^[1]、约翰·格雷(John Gary)的《自由主义》^[2]、皮埃尔·莫奈(Pierre Manent)的《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3]、泽田谦的《自由主义》^[4]等著作已经较早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于“自由主义”这一思潮进行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而在中国,80年代以来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5]《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6]《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1945—1949》^[7]《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8]等论着阐释了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语境中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9]《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1898—1937》^[10]《中国“自由”派文学的流变》^[11]等论着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文学一脉的发展及流变。相关论着的大量出现,重新挖掘出了大量文学研究史

收稿日期:2015-11-18;修回日期:2016-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12AZD09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中外诗学资源及其共生模式研究”(15YBA359)

作者简介:张慧佳(1988-),女,湖南怀化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料,使得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重新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焦点地带,其重要的价值亦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而得到客观的评价和肯定。

然而,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着学理意义上的“缺失”。具体而言,这种“缺失”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主体间性缺失”“对话性缺失”和“共生性缺失”。

一、主体间性缺失和解决的理念、方法

主体间性缺失,即研究者以一种静止、封闭的视野中观照研究对象,从而忽视了研究对象与社会场域中其它权力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12](134)}按布迪厄所言,一个权力主体的意义须在对于其所处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中确立,文学场从来就是一个权力关系场域,居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诗学形态都是一个权力主体,会就某一问题与他种诗学形态进行话语交流,甚至权力斗争。而作为社会场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学场也与其它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文学的研究,不应脱离场域之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对单一文学现象进行封闭式的研究。

然而,综观既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研究者在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时,并未从现象与现象、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出于对自由主义诗学的“为艺术而艺术”“审美自律”等诗学观念的认同,许多研究者在新批评学派的文本细读的方式影响下,认为文学作品是与外界绝缘的、独立自足的有机体,并将此观念带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研究工作中。夏志清正是在这种批评方法影响之下,反对以往学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倾向,为了实现文学之独立品格,他借鉴了利维

(F.R.Leavis)“伟大的传统”观念,以道德关怀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梳理出了一条关乎“人性”的“伟大的传统”,这显然是有别于在“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导向下的左翼文学批评家所建构的传统现代文学空间的。

在重建中国现代诗学的过程中,夏志清将“文学性”置于首位,“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从而“不遗余力地批判那些或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情的作者”^[13]。学界一般认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的推出,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受其影响,国内研究界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转向,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此前被主流话语空间所排斥的作家在该时期成为了众人热议的对象。应该说,夏志清的批评方法确实为国内的文学创作领域和批评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有学者就认为,“大陆地区的学者,长期以来存在着‘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而这种以政治偏见干预文学批评的方法会使得文学的道路“愈走愈窄”,同时,他十分赞许怀揣着“拓荒的热情”的夏志清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注重对作家艺术个性的剖析”,从而在美的层面上重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14]如果说国内研究界关于夏志清的批评模式仍存有一定的争议的话,那么,可以说,海外汉学界对此则是比较一致地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诗学观是基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而发的,其对于人的自由与尊严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则更是在肯定夏志清的基础上,以“现代性”理论对之进行发展。有研究成果就谈到,夏志清及其后的李欧梵、王德威三人均以“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为“他者”,并共同建构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模式来对抗左翼文学的“宏大叙事”模式,从而以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15]

应该说,夏志清及其支持者所青睐的这种批评方式,是为反对主流的左翼文学话语的政治偏见而生的,然而,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批评方法受到了“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的影响,存有较为突出的问题。他们在试图将文学从左翼文学阵营的政治偏见中拯救出来的同时,却以一种偏激之势将文学带入了艺术偏见的泥潭。因为,作为社会场的一部分,文学是不可能真正存在于“真空”之中的。正如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派领军人物瓦雷里(Paul Valéry)在提出“纯诗”这一概念的几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诗,永远是企图向着这一纯理想状态接近的努力。”^{[16](304)}因此,研究者须得以一种系统

和完整的视野来审视文学现象。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可能真正完全根据“纯粹逻辑的可能性”或“认识内在辩证法”等内在法则来进行,因为社会环境在知识的生成及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基于此,他提出知识社会学理论,并阐述到,该理论“指向一种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导致如下问题的提出:社会结构何时、何地开始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中?在什么意义上,前者具体地决定后者?……我们用这个术语指的是主体构想事物的整个模式受到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17](270)]。也就是说,曼海姆认为研究者应始终坚持“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从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寻找不同知识类型的生成原因,从而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知识话语形态。其后,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社会权力关系对于知识的生成及其具体形态的重要影响,在权力网络中,不光是知识,就连“真理”也成为了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按照知识社会学和权力关系理论,某一类型的知识话语的生成受制于特定社会群体,且与该群体的利益挂钩,因此,文学不可能真正摆脱“他律”而实现彻底的“审美自律”,研究者也须得从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入手,来对文学现象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完整且系统的分析。对于知识社会学等理论的借鉴,将有效地克服现代认识论的主体先验性,避免“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真实客观地呈现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全貌。成仿吾指出:“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层建筑之一;离开全体,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个的部分,我们必须就社会的全构造考究文学的这一部分,才能得到真确的理解。”^[18]在具体的研究中,彻底割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设想显然是不现实的。虽然周作人一再提及要开辟“自己的园地”,不再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朱自清、梁遇春、废名等人亦随之表示出避世之态,但如若一个研究者亦以割裂的视角而将研究止步于仅仅描述文学现象,却忽略了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分析该审美价值的成因的话,无疑是片面的。

事实上,政治因素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干涉及威胁,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文学革命与社会现实的彻底失望才是促使以周作为代表的一众自由主义诗学家选择以西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诗学来建构其自身的话语体系的主要原因。此外,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来考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可以发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虽是在西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诗学资源的

直接启发下形成,但经历了一番跨语际旅行后的诗学话语却在本土文化经验的影响下产生了内涵上的变异,这主要表现为一种由偏至转向折衷的趋势。“契合”(correspondence)这一概念初由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提出,原指个体与超验世界之间的交响,而穆木天在《谭诗》一文中介绍该概念时则有意误读“交响”(即“契合”)一词的含义,于该词原有的“个体性”内涵之上赋予了“社会性”的含义,并指出“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两者都不能存焉”,更甚之,将社会性置于个体性之上,认为“国民的历史能为我们暗示最大的世界、先验的世界”。^[19]这种折衷的倾向表明,自由主义知识在坚持其“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审美信仰的同时,是不可能真正排除社会语境对于自身理论建构的影响的。

由此可见,作为社会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参与其中的诗学主体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将文学与政治、经济、历史、道德等建构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且随时根据外在的现实契机及内在的系统运作状况而适当地对相关的诗学资源进行吞吐,不断调适自身的诗学话语形态,以使之优化并发展。要解决既有的关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主体间性缺失”的问题,研究者就须以一种开放的视野观照中国现代诗学场域,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客观的态度正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社会场域内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其它外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借鉴知识社会学和权力关系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对之进行分析,以防止再次将文学批评带入“政治偏见”或者“艺术偏见”的泥潭,并在避免文学研究的片面性和封闭性倾向的同时,完整地发掘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丰富的话语内涵和美学价值。

二、对话性缺失和解决的理念、方法

对话性缺失,即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诗学资源构成时未能以一种平等性、跨越性的视野来观照中西诗学资源的对话,从而使得中西文明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建构过程中并未处于平等的地位。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身处内忧外患之境,时代环境之恶劣与历史使命之迫切,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引入西方近代以来的诸种诗学资源,以期实现启蒙民智与文化现代性转向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现代诗学主体出现了片面、单一

地借鉴西方诗学资源以解除中国文化危机的倾向。王国维早在1904年就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阐释《红楼梦》并写下《〈红楼梦〉评论》这一给予中国现代诗学巨大启发的著作，扩展了中国人的学术视野。进入五四文学革命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资源的接受更是陷入了一种单向阐发的怪圈，正如穆木天、王独清等早期象征主义派诗人在对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推介工作中，往往只考虑到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之启发性，却未能以一种跨越性、综合性的视野来观照双方的平等对话。在这种片面突显西方诗学理论之优越性的倾向影响之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了相似的倾向。

既有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诗学完全是“近代欧风美雨的吹拂沐浴下”^{[9](2)}的产物，它源起于晚清以来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的对西方自由主义相关理论的译介，发展于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人对欧美及日本相关思想的提倡及践行推广。更甚之，有学者认为，相对于“近现代西方没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文学、反自由主义文学”而言，“中国古代无自由主义文学思潮”^{[20](327)}，“中国文化因其早熟性和模糊性，对外来文化有非凡的同化力，几乎每一种西洋学说和名词，都有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在古旧典籍中找到‘原版’，这已经成为老大帝国、‘世界之中’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然而，自由和自由观念，是无论多么善于圆滑变通的人也无法在古代中国找到对应物的。”^{[9](11)}这些成果将“自由和自由观念”完全视作西方文化的结晶，却将之绝缘于中国传统诗学。

可以说，这种一味强调西方诗学之优越性而轻视中国诗学资源之主体性的话语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固定且主流的话语模式，在该模式中，西方诗学资源占据中心位置，中国传统诗学资源则居于边缘。然而，以场域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场是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网络，多种诗学资源于其中相互抗衡、相互阐发、相互补充，中国传统诗学资源不仅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且作用不可小觑。事实上，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形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理论资源可以追溯至西方“天赋人权”理论，该理论立足于个人权利，为对抗极权统治，维护个体的人身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等权利而生。因此，自由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即“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然而，于强权压制之下追求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亦有迹可循。自老庄起，重精神、蔑功名、尚无为、

任自然的处世态度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精神长河中一条绵延不绝的支流。庄子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之思而追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1](2)}的绝对自由境界。时至魏晋，经学衰落，社会上更是兴起了一种“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22](115)}，黄老之说再度盛行。嵇康有言：“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23](145)}强调“精神”之于人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24](231)}，主张人应任性自然，随心而为，抛却名教礼法束缚。阮籍、山涛、刘伶等人遂以之为尚，“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22](156)}，推动了中国文化史上人性和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对后世大批文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晚明以来诸如李贽、金圣叹等众多进步知识分子，对此种潇洒任达的处世态度，寻根振叶、观澜索源，有掀波盖潮，启锦扬花之势。此外，作为一套有着独立审美追求与主体思维的诗学传统，中国古典诗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这些隐性因素也使得中国诗学对于西方诗学资源的接受行为体现出一种主动性和反思性。比如说，作为集体文化经验而积淀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的“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就推动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现代主义诗学的会解，因此，以一种平等、宽容的研究态度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体系中的中西诗学话语资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与中国学界因缺乏文化自信而未能对本国诗学资源的丰富内涵作出客观的评价有关。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将东方世界视作世界历史的起点，因为他认为，东方文化缺乏“精神”的自主性，并未能超越自然的束缚而成为“自在而自为的存在”^{[25](15)}。显然，为了构建起所谓的绝对精神的逻辑规律，黑格尔将东方文化作为对立于西方文化而存在的“他者”，从而对东方文化进行了主观的变形和扭曲。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中国文化则缺乏应有的自信，季羨林先生就此直言：“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26]曹顺庆先生也曾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

国传统文论就基本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27]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提出,是中国文化内部对于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积弊作出的自省和清算。与之相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针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关于中西诗学资源分布中存在单向倾斜的问题,提出了“双向阐发”的主张,意即“坚持文明之间的平等性对话立场,强调不同文明文学之间的平等地位,反对一方理论对另一方文学的垄断与独白。具体说来,就是要求阐发的对等性和互为主体性”^{[28](260)}。这一观念颠覆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以西释中”的问题,力争使中西诗学资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对话”成为“双向阐发”中的关键概念,也就是说,学界已经意识到,单方面的“鹦鹉学舌”并不能真正推动中国诗学的合理重建。其实,周作人早在1926年就已意识到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中西诗学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资源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进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青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29]周作人之“融化”说既肯定了“模仿”于文学发展之重要性,又强调了传统文化于新文学建设之根本性,对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而言,无疑是极有启发性的。因此,相对于穆木天、王独清对于象征主义诗学的片面性、断裂性的介绍,从跨越性、综合性视野出发的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学则显得系统且成熟,他“以融通中西诗学的广博知识,兼具诗人与诗论家的双重身份,跨越了中西两种理论话语的鸿沟,在中西诗学的相互沟通、相互融会中对纯诗理论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从而成功地拒绝了穆木天、王独清纯诗理论单一偏重西方诗学的理论取向”^[30]。可以说,梁宗岱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中西诗学的平等对话,是因为其在注意到中西诗学之“同”时,亦观察到了双方之“异”,以及中国传统诗学之主体性。

由此可见,以建构中西双方诗学资源的平等对话为前提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而言,是颇有意义的。综观上述情况,针对既有成果中存在的“对话性缺失”的问题,研究者若以结

构主义和权力关系理论为依据,从研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重点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话语体系中的中西诗学资源的话语论争、权力抗衡、观点互补和文化阐发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实现中西诗学资源的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作出一份客观的评价。

三、共生性缺失和解决的理念、方法

共生性缺失,即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时,往往忽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系统中的其它成员之间有着共在共生、互相影响的重要关系。结构主义理论家皮亚杰(Jean Piaget)指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换体系作为体系(相对于其各成分的性质而言)含有一些规律。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31](3)}按其所述,系统是由存在差异性、且相互联系的成分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各成分于其中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且需不断以转换的形式来实现自身调整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和各组成成分的意义也依赖彼此而得以成立。

借皮亚杰之结构主义理论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我们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该诗学形态由多种共生于其中的中西诗学资源经过转化、融合而自成了一套较为恒定的话语体系。然而,作为中国现代诗学这一整体诗学系统的一员,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又与保守主义诗学、马克思主义诗学共在共生,且相互作用。皮亚杰研究发现,一个结构包含了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三种特性^{[31](2)},也就是说,既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与保守主义诗学、马克思主义诗学共生于中国现代诗学这一完整的结构之中,就必然会为结构整体的优化发展而与另外两种诗学形态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而且,任意一种诗学之理论发生、话语建构、理论深化均与其它的诗学形态脱不了干系。譬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理论就发生于中国现代的诗学主体的危机意识之中,由于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之强势冲击下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才提出以西方自由主义诗学资源建构中国新文学的设想。同样,如果说梁实秋的最早的人性论是用来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论和工具论的话,那么,其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则是在其与鲁迅、冯乃超、郁达夫等一系列左翼知识分子的论争中得到了实现。因此,若要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就不能忽视三

种诗学形态于中国现代诗学系统内的组成规律，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已有大量著作及论文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并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之“缘起”和“流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这些成果在考察和评价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时，或如“移植与萌芽——自由观念与中国近代文学”“同途而殊归——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对立与互补——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论析”“挣扎与终结——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论析”^[9]一般，从纵向上按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自然的时间分段梳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流变，又或如“自由主义文学生成的驱动力”“自由主义作家的精神特质”“自由主义文学的叙事形态”“自由主义文学的美学风尚”“自由主义作家的批评话语”^[32]一样，从生成机制、精神特质、美学价值、话语内涵等角度全面分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系统性的文学形态，这对于重估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而言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成果在审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时，往往是将“自由主义文学”独立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仅关注“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发生、发展、陨落，却割裂了作为诸多文学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文学等其它文学形态的间性关系。即便有部分章节谈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形态之间的论争，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背景而对之进行简单的论述，却并未将其置入一个动态的中国现代诗学系统，从而在其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等其它诗学力量的权力关系中对之进行更为深刻的审视。可以说，这些研究方法均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与其它诗学形态、与整体诗学结构的互动关系，使得自由主义诗学孤立地独存于乌托邦的“理想之境”之中，并不能真正展示其本质属性，明显存有偏颇之处。

在皮亚杰看来，一个结构的整体性并不表现为各自孤立存在的组成成分的简单联合叠加，事实上，各成分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成体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31](3)}。以此观点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我们可以发现，该诗学体系具有整体性、同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同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诗学、马克思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虽在文艺本质、思维方式、表现形式以及文艺功能等基本问题上观点颇有差异，而且，为了维护自身诗学话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彼此之间亦展开过激烈的话

语论争。但究其根本，共生于中国现代诗学场域内的三种诗学形态均是民国^①知识分子为应对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而提出的建议，而且，三者终极诉求上明显具有同一性，这主要表现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学形态的现代化转向。虽然自由主义诗学和保守主义诗学一度表现出“避世”和“复古”的状态，但是，细察之则可发现，对于社会现实和民族前景的忧虑，牵扯着每一位身处于该时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避世”“复古”或“激进”，只是各类知识分子对于这份忧虑的不同表现形态而已。

既然三种诗学形态共生于同一系统之中，且在很多重要方面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倾向，那么，三种诗学形态的存在形式及发展态势就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就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是一众知识分子之共同诉求，为尽快完成“破旧立新”的历史任务，革命精神极强的浪漫主义诗学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以早期创作社成员为代表的大批怀着改革热情的文人均将浪漫主义诗学奉为主臬，浪漫主义诗学因此一度占据了现代诗学场域的主导地位。然而，当旧文学在与新文学的对话中败下阵来时，“新”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对于“美”的诉求则超越了“新”而成为这一阶段的关注焦点。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转而殚精竭虑于从审美层面出发矫正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学此时得到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极高关注，“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纯诗”“审美无利害”等成为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出现频率极高的诗学话语。而其余两种主要的诗学形态也在该时期就这些问题与自由主义诗学展开了激烈的话语论争。当然，历史现实的特殊性决定了自由主义诗学只纯粹关注文学之审美价值而忽视文学之社会功能的思路的乌托邦性，经历了20、30年代多种诗学话语的论争和转换等调整过程，中国现代诗学在总的发展方向上表现为从“偏至”转向“融合”，时至40年代，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终表现出了一种“个体性”与“集体性”、“感性”与“知性”、“经验性”与“超验性”、“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融合趋势。由此可见，中国现代诗学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结构体系，而非一个静止的“形式”，自由主义诗学、马克思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等诗学形态也并非以孤立且断裂的状态存在其中，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或价值融合，不仅暗示了其背后的社会现实，而且对于某一种诗学形态或整个中国现代诗学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诗学系统根据自身系统内部所需或外在社会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结构调

整,这种调整维持了系统对外和对内的基本守恒,有利于诗学系统的整体优化发展。

因此,针对“共生性缺失”的问题,研究者须以结构主义的系统理论和权力关系理论为理论参照,正视、并积极建立起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场域内的其它诗学的间性关系和权力关系,并通过对不同诗学形态在同一系统内共生、互相补给的关系的分析,以期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话语内涵及历史价值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针对既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三种“缺失”问题,笔者认为,及时更新该问题的研究方法,以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视角观照现代与传统、本土与西方的诸种诗学资源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研究成果中仍普遍存在“主体间性缺失”“对话性缺失”和“共生性缺失”三大问题,因此,引入权力关系、结构主义、文化社会学等文化理论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将更科学、客观地呈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乃至中国现代诗学的系统结构、形式与功能以及演化的复杂性,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从权力关系的视角出发,审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讨论、处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关系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可以发现,在辩证思维的带动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家在配置古今中外各类诗学资源时显示出的诗学观念的优越性,是此前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关注到的。因此,重新梳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体系中的中西诗学资源的共生模式,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再次,这种通过诠释传统而建构起“历史”与“现实”之沟通的工作,虽在表面上是以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这是指向现实,并对于现实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的。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主动攻势下,中华文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转向的潮流,如何配置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异域诗学资源,从而采撷中西文化之菁华以建构新文学,就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处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跨越的视野、宽容的态度和冷静的思维,对于中国文学的建构和发展而言,无疑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价值。由此,反思并重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本文中所涉及的“民国”概念,指涉的是1912年至1949年间

的“中华民国”政权。具体来说,该政权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后始建,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为标志,后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结束。中华民国政权统治期间,政权的不稳定,内忧外患的频繁困扰,使得国内局势数次经历大的动荡,当然,这也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参考文献:

- [1] 霍布豪斯. 自由主义[M]. 朱曾汶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约翰·格雷. 自由主义[M]. 曹海军, 刘训练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3] 皮埃尔·莫奈. 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M]. 曹海军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 [4] 泽田谦. 自由主义[M]. 罗超彦译. 上海: 华通书局, 1929.
- [5] 何卓恩. 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 [6] 胡伟希, 高瑞泉, 张利民. 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7] 曹建坤. 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力量: 1945—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8] 任剑涛.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9] 刘川鄂.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 [10] 胡梅仙.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 1898—193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1] 陈国恩, 张森, 王俊. 中国“自由”派文学的流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12]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康, 李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3] 王德威.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4): 17-27.
- [14] 古远清.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小说评论[J]. 贵州社会科学, 1992(12): 33-37.
- [15] 郑闻琦. 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4(1): 9-14.
- [16] 瓦雷里. 论纯诗(一)[C]// 葛雷, 梁栋译. 瓦雷里诗歌全集.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 [17]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8] 成仿吾.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 创造月刊, 1928, 1(9): 1-7.
- [19] 穆木天. 谭诗[J]. 创造月刊, 1926, 1(1): 80-88.
- [20] 刘中树, 许祖华.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1] 庄子. 逍遥游[C]// 庄子.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 [22]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23] 嵇康. 养生论[C]// 嵇康集注.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 [24] 嵇康. 释私论[C]// 嵇康集注.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 [25]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 王玖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6] 季羡林. 东方文论选·序[J]. 中外文化与文论, 1996(1): 242-243.
- [27] 曹顺庆. 文化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 文艺争鸣, 1996(2): 50-58.
- [28] 曹顺庆. 比较文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9] 周作人. 扬鞭集·序[C]// 杨匡汉, 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上).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5: 128-130.
- [30] 赵小琪. 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J]. 文艺研究, 2004(2): 56-62.
- [31] 皮亚杰. 结构主义[M]. 倪连生, 王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32] 李火秀. 诗意回归与审美超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Research review on Chinese Modern Liberalist Poetics

ZHANG Huiji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mbe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odern poetics, Chinese Modern Liberalist Poetics owned a set of valuable poetic discourses for its persistent pursuit of independent character, which made i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in those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re exist such three kinds of problems as defici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deficiency of dialogue and deficiency of coexistence. The present essa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 three problems, which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Liberalist Poetics; research review; defici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deficiency of dialogue; deficiency of coexistence

[编辑: 胡兴华]